

概 述

青海出版书刊涉及的文种，主要是汉文和藏文，另有为数不多的蒙古文图书。据《魏书》和《北史》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南凉国国王秃发 儁 檀之子源贺，参考一些兵法图书用汉文编撰了《十二阵图》一书，以手抄本形式行世，惜全书已失传。青海藏文图书产生于宋代。当时，廓州唐述山下（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加入村人喇钦·贡巴饶赛（952—1035）用藏文编著了《朵却》和《回向广颂》两本宗教方面的图书，《回向广颂》在元代被辑入号称藏族社会百科全书的《丹珠尔》大藏经纳塘版目录中。汉文图书的刊行晚于藏文，至明代始正式有汉文图书的刊行。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西宁兵备道刘敏宽、西宁同知龙膺合修了《西宁卫志》，并予刻版刊行（见《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3页）。明、清两代，青海地区编著、印行的汉文图书比较多，约在100种以上。清乾隆十二年（1747），西宁道僉事杨应琚编修《西宁府新志》共40卷，总字数40余万，刻版刊行后，深受后人重视，被认为是“本地区有开创性的方志著述”。明、清两代，青海的汉文图书以地方志著述居多，散文、诗歌等次之。这些图书是在青海地区刊印，还是在省外刊印，有的已难区分。最早有刻书牌记证

明为青海地区刻本的汉文图书，当推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的宗教图书《文昌帝君化书》。该书分上、下两册，刻版 126 块。这个时期多数汉文图书刻本显得粗糙，只有少数刻工较好。咸丰五年（1855），西宁贡生张敦实、张复兴等捐资募工重刻的《桂宫梯》8 卷 4 册，就刻工精细、字体秀丽而言，堪称佳本（青海省图书馆藏有本书）。清代后期，青海图书发行业已萌生。咸丰年间（1851—1861），西宁城内曾出现一家面向社会、主要销售汉文图书的发行机构——“集成堂”书铺。

明、清时期，由于藏传佛教在青海的深远影响，藏文图书的编著和印行都处于高峰时期，其规模和影响也都略胜汉文图书一筹，缮写和刻印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个时期，青海地区已先后建立了数百个规模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为弘扬佛法，一些寺院陆续创建了印经院（房），专司编印经文典籍、高僧著作之责。清代末年（1911），青海已有较大的印经院（房）20 余个，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湟中县鲁沙尔镇的塔尔寺印经院。该院于清道光七年（1827）创建后，刻印了大量的藏文典籍。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拉加寺活佛香萨·罗桑达杰嘉措在该寺开始组织刻印大藏经《甘珠尔》历时 10 年 耗银 5 万余两，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刻完毕，总计 105 函，开青海地区大规模刊印藏文图书的先河。据统计，明、清时期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刊行的藏文图书约 3 000 种，仅拉加寺、塔尔寺、夏琼寺、隆务寺、佑宁寺、噶藏寺等 20 多个印经院刻印的藏传佛教典籍即达千余种。这个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印经院实际上已成为藏文图书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出版机构。

二

民国时期（1912—1949），青海的书刊出版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仍主要靠木版刊刻，此时已出现了以刊印图书为业的刻字店。民国 10 年（1921），西宁人李生祥、李生麟兄弟开设了刻字店，曾刻印《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是青海地区较早的民间印刷单位。

20 世纪 20 年代，石印技术传入青海，印刷单位日渐增多。民国 12 年（1923），西宁人张子厚从外省购进石印设备，在西宁开设了青海地区最早的石印铺——张厚记印刷所。其后，私营印刷单位相继增加，至民国 38 年（1949 年）西宁地区已先后出现了十余家印刷店铺，但多数规模小，职工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人。规模较大的为华兴印书铺，该铺于民国年间曾印刷了藏文工具书《司都氏文法详解》等。这个时期，还有天兴成等 6 家民营书店兼营印刷业务。

民国 18 年（1929），青海正式建省。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局于当年成立了印刷所（石印），有员工 13 名。该印刷所为青海省第一个公营印刷单位，主要承印省政府秘书处主办的《青海省政府公报》、《新青海报》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活字印刷技术开始传入青海。民国 15 年（1926），天兴成书店从外地购进一些铅印设备，用来印刷表册、名片等小的印件。青海使用铅印技术印刷书刊，始于民国 21 年（1932）。当年 6 月，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成立青海国民印刷局，有员工 30 余名，从外省调进和购置了铅印设备，开始铅印《青海民国日报》和个人著述。民国 22 年

(1933)，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创办青海印刷局，先后印刷了《西宁府续志》、《生命树》、《敬业草堂嚼蜡吟》、《回教必遵》等多种图书。民国 38 年（1949）年 2 月，湟中实业公司印刷局成立，不久，青海印刷局并入湟中实业公司印刷厂。这时官办（公营）的印刷机构有两个，即湟中实业公司印刷厂和青海国民印刷局。这两个单位均设在西宁市，共有职工百余名，有大小印刷设备 30 多台（件），有土木结构房屋百余间。

民国时期，青海印行的汉文图书以文化教育类和文学艺术类图书居多，无科技类图书。藏文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有了新进展，打破了长期以来专由寺院印经院经营的局面。民国 10 年（1921），西宁道尹黎丹创建了以研究藏文和编译藏文图书、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为宗旨的“西宁藏文研究社”（1929 年改名为“青海藏文研究社”）延聘名士高僧给社员讲授藏语文知识并从事藏文图书的编译、出版活动。在该社存在的近 20 年中，黎丹等人编译、印行了一些受人称道的藏文、汉文对照图书，如《禅师与鼠》、《猴鸟的故事》、《萨迦格言》等。黎丹还主持编纂了当时国内仅有的一部《藏汉大辞典》，全稿约百余万字，因印刷条件限制，未能印行面世。民国 22 年（1933），藏文研究社成员杨质夫鉴于《藏汉大辞典》一时难以印行，便将其中主要词条摘出，缩编成《新编藏汉小辞典》，由省政府印刷局于 1933 年石印发行。

民国时期，青海的图书发行业已有了一定规模，经售汉文图书的书店（铺）渐有增加。至民国 38 年（1949），西宁地区先后出现的私营书店（铺）有 20 家左右，从业人员最多时达 40 余人。这些店铺，一般规模不大，职工少的一二人，多的三四

人，有的兼营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有的还兼营印刷业务，但对传播文化知识，扩大图书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民国 33 年(1944)，中国新文化服务社西宁分社负责人孙昌龄，为发行进步书报事，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进行联系，被邮检部门发现后，即遭到当局逮捕，经严刑拷打，被活埋于西宁市南门外。

民国时期青海的书刊出版业虽有所发展，但尚未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没有面向社会的专门图书编辑出版机构。据统计，民国时期青海印行的汉文图书约 50 种，藏文图书 100 余种，汉文期刊约 20 余种，但多存在时间不长，各种期刊发行量亦甚少，每期一般仅发行数百份，发行量最大的《青海评论》，每期发行数也只是千余份。

三

青海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青海建立之后。1949 年 9 月，人民政权在接收旧政权所办的湟中实业公司印刷厂和青海国民印刷局的基础上，迅即建立了西宁印刷厂（后改名青海日报印刷厂），交由青海日报社领导。该厂除印刷《青海日报》外，并承担印刷书刊的业务。随着形势的发展，青海又先后建立了西宁新生印刷厂和青海印刷厂。前者除印制汉文书刊外，主要承担全省藏文书刊的印制任务，后者则主要印制汉文书刊。

1949 年 9 月到 1950 年底，青海书刊编辑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治部、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公安厅、青海省文教厅等，

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先后编印了一些政治、文教类图书。这个时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青海军区政治部编印的《建设红旗漫卷青海》一书，是青海解放后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读物。由西宁市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人民歌曲》，是青海人民政权建立后出版的第一个汉文文艺刊物。

1950年3月22日，统管全省图书发行的国营新华书店青海分店建立。该店除努力做好图书发行工作和指导私营发行业外，还积极开展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截至1953年8月，该店共编辑出版了18种图书，其中有政治、经济、文艺和教育等方面的读物，仅藏文小学课本即达10种，总印数10万册。这些课本，除满足青海本省需要外，还发行甘肃、四川、西藏等省。1956年前后，新华书店青海分店还协助政府完成了对私营书店的业务指导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全省农业区各县和牧业区各州建立了支店，在一些供销社、民贸公司建立了图书代销点，基本上建成了全省的图书发行网。

1953年8月18日青海人民出版社筹备处建立，翌年5月25日，青海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综合性图书编辑出版机构——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该社成立之后，努力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遵循“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原则，积极编辑出版汉、藏两种文字的各类通俗读物，尤其着力于编辑出版藏文图书。到1965年底，已出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科技等类自编汉文图书1083种，藏文图书779种；还出版《青海画报》、《上游画报》等期刊5种，租型印制图书106种。1949年9月至1965年，青海还先后出版了政治、文教、科技等类期刊，共90余种。

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里，青海书刊出版业出现了失误，以盲目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青海人民出版社在稿源贫乏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搞选题、出书的“大跃进”。1958 年出书 218 种，比 1957 年增长 228%；1959 年出书 410 种，比 1958 年增长 88%。数量虽然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有的甚至存在明显错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仅 1965 年，经省文教厅批准，该社出版的图书报废的即达 240 种。省新华书店也脱离实际，提出“全民办书店，社社有书店，队队有发行员”的口号，要求发行工作“打擂比武”、“放卫星”、“夺高产”以致大量图书积压，帐目不清。印刷行业情况较好，虽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生产未出现太大的波动，由于书刊印刷任务的增大，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1958 年成立的西宁印刷厂和海南印刷厂后来都逐渐发展成青海省书刊印刷业的骨干厂。

1960 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青海书刊出版业进行了调整和整顿。1961 年底，省上决定将 1959 年成立的青海教育出版社并入青海人民出版社；将附属青海教育出版社的印刷厂并入青海印刷厂。经过调整和整顿，青海书刊出版业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提高。

青海人民出版社在 1962 年到 1965 年期间，每年本版图书出版种数均控制在 100 种之内，特别强调提高质量。在出书种数中，文化教育和教材类图书所占比重较大，1962 年占总数的 57.7%，1963 年占 72.8%，1964 年占 76.8%，1965 年占 80.4%。这些图书适应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正当青海书刊出版业经过调整和整顿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于 1966 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青海书刊出版业的主要任务即转变为集中全力，印刷、发行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适应“文化大革命”需要的读物。各类期刊，多停止出版。为了保证印刷好毛泽东著作，青海人民出版社将绝大部分编辑人员分成三班，进驻印刷厂昼夜校检刚下机的毛泽东著作的印张，看墨色是否匀称，字迹是否清晰等。1966 年一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租型印刷的毛泽东著作就有：64 开精装本《毛主席语录》27 万册，32 开平装本《毛主席语录》30 万册；各种毛泽东著作单篇本 156 万多册。这一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汇集报刊主要文章的《政治学习文选》。这是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的政治读物，到年底即出版 40 多集。“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图书基本停止出版，就是学校课本也打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烙印。到 1971 年，开始出版科技类读物。“文化大革命”10 年间，青海人民出版社共租型印制汉文毛泽东著作 171 种，总印数 2 100 余万册，还租型印制大量毛泽东标准像和生活像。

要高标准、大批量印制毛泽东著作，印刷能力显得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省上决定扩大印刷能力。1967 年 7 月，青海印刷厂在西宁市贾小庄选定了新厂址，开始建造新厂房，1968 年上半年新厂房建成投产。这一年，青海印刷厂的生产能力显著扩大，年汉字排版能力达 3 129.6 千字；书印能力由 14 756 令提高到 23 895.4 令，零印能力为 7 463.2 千印张；年胶印能力由 15 284 对开色令提高到 22 449 对开色令。

由于大量的毛泽东著作运往青海省新华书店及各州、县新

华书店，因而出现了库房严重不足的情况。1967年8月，省上决定扩建青海省新华书店的库房，拨款47.5万元，增建库房面积900平方米；给西宁市新华书店及一些州、县新华书店也拨专款扩建库房或修建新的门市部。

为了搞好毛泽东著作的印制和发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5月3日决定：将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省新华书店和青海省毛主席著作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合并，成立“毛主席著作青海省出版发行管理处”，撤销原各单位建制，人员进行调动，青海新华印厂（青海印刷厂于1968年5月改称此名）也归该管理处直接领导。该处既是全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也是具体的编辑出版单位。1969年10月，原青海人民出版社绝大多数职工下放到省军区设在民和县的农场进行“斗、批、改”，实际上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从管理处成立到撤销，出版图书共30余种。1971年5月，省革委会决定撤销“毛主席著作青海省出版发行管理处”，恢复青海人民出版社和青海省新华书店建制，全省书刊出版业归省文化局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海出版业的情况是：一方面“书荒”严重，读者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另一方面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大量积压，浪费大量资金，仅省新华书店就积压毛泽东著作达270多万册。1980年，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省新华书店一次就处理毛泽东著作189905册，总金额达52.9万元。

四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

结束。在党的领导下，青海出版、印刷、发行等单位的职工开始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深入人心。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下，有关部门相继采取了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的措施。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于 1979 年 12 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确定，地方出版社应“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这个方针的制订，大大鼓舞了地方出版社的职工，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地方出版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加强对全省出版工作的领导，省政府于 1980 年 5 月，成立了青海省出版事业管理局。1983 年 10 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决定撤销青海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将青海人民出版社升格为厅级单位，统管全省书刊出版工作。

1977 到 1985 年，是青海书刊出版事业发展最快、成绩最为显著的时期。过去青海没有专管印刷物资供应的机构，印刷物资供应工作一直由文化教育部门代管，很不利于青海印刷业的发展。1982 年 5 月青海省印刷物资站成立后，加强与各省区的横向联系，采取多渠道、少环节的进货方式，不断拓宽经营范围，千方百计满足各印刷厂的需要。到 1985 年底，该站虽仅有职工 11 名，但年销售额已达 186 万元，年盈利 8.5 万元，为青海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促进了青海书刊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到 1985 年底，青海主要书刊印刷厂已由 1976 年的 3 个发展到 4 个。为适应书刊市场不断扩大的形势，书刊印刷的经营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厂家积极更新设备，努力改进经营管理，

使生产出现新面貌。期间，青海新华印刷厂购进了电子分色机、照排机和胶印机等先进设备；西宁印刷厂购进双色胶印机、胶印轮转机；青海省海南印刷厂购进了 J2205 型胶印机等设备。这些措施，都大大提高了青海书刊印刷的效率和产品质量，有些产品在全国和大区范围评比中多次获奖。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到 1985 年底，仅青海新华印刷厂、西宁印刷厂和青海省海南印刷厂 3 个厂就有职工 1 000 余名，各种机械设备 200 多台，年汉文排字能力达 1 亿字以上，年藏文排字能力达 1 000 万厘米，书印 10 余万令，胶印 5 万以上对开色令。青海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青海出版事业的发展。

青海图书发行业在 1977 年前的 20 多年间，虽有较大发展，但只有新华书店一家，无竞争对手，缺乏竞争意识。随着中央改革方针的提出和推行，青海省新华书店和青海省外文书店结合青海实际，积极进行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注意发展集体书店和个体书店（书摊），逐步实现图书发行渠道多样化。青海省新华书店由于进行改革及加强管理，改善经营，1979 年在扩大销售的基础上，实现利润 11 万元，一举结束了以往长期亏损的局面。到 1985 年底，全省有国营书店和销售点 141 个，集体书店和发行点 329 个，个体书店 126 个，初步形成一个以国营书店为主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格局，促进了全省图书市场的繁荣，提高了图书发行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统计，1985 年，仅国营书店销售图书即达 2 040 万册，总销售金额 1 427 万元，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 19 万册，金额为 24 万元。这一年盈利 38 万元。

1977 年以后，青海的书刊编辑、出版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期刊陆续复刊，同时又有更多的新期刊创办起来。到 1985 年底，全省已有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期刊 70 余种。1977—1985 年间，青海教育出版社共计编译、出版汉藏文中小学教材 179 种。1980 年 9 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和青海民族出版社经上级批准，开始自办本版图书邮购和门市售书业务。从 1984 年起，两社积极探讨编辑、出版方面的改革，于 1985 年开始试行编辑、校对人员岗位责任制等改革措施，推动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青海人民出版社和青海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图书不仅数量有增加，门类有扩展，质量也有显著提高。据统计，1977—1985 年间，两社共出版汉文图书（含本版重印书，不含课本和租型图书）506 种，藏文图书 184 种，比 1968—1976 年出版的同类图书分别增长 17.4% 和 31.4%。这个时期除正常租型印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作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类图书，既注意出版通俗读物，亦注意出版学术著作，并且注意对古籍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著述的大力扶持出版。1977—1985 年的 9 年中，两社出版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读物达 288 种，不少图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甚至是填补空白之作。截至 1985 年底，青海人民出版社和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全国、大区和全省范围的评比活动中获奖的有 54 种（其中汉文图书 40 种，藏文图书 14 种）有不少图书如《青海》（画册）、《青海省情》、《青藏高原药物图鉴》、《高原疾病》、《新编藏文字典》等在群众中获得好评。同时还有 278 种计 1 028 册图书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际

市场。这个时期，出版的书刊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重视对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和发行。由于印刷、发行等部门的积极配合，中、小学教材已连续 8 年（1978 年至 1985 年）基本实现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要求。

回顾 30 多年所走过的历程，青海的书刊出版业成绩显著，失误也同时存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30 余年来，在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书刊出版部门培养了一大批编辑、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专业人材，印刷、发行条件不断改善，积累了丰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都为今后青海省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青海的出版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一章 书刊编辑出版

第一节 编辑出版机构

明代以前，青海没有专门的编辑出版机构，文人著述多以私人抄本行世。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青海广泛传播。寺院日增。各地寺院为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相继设立印经院，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遂成为以刊印藏文佛教经典等著述为主的编辑出版专门机构。民国时期，黎丹创建青海藏文研究社，编译、出版一些藏族文学名著、藏文工具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前线生活》报社编辑出版了一些政治读物和宣传材料。1950年3月新华书店青海分店成立。该店除统管全省发行业务外，还主持过编辑出版工作。自195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青海历史上才有第一个编辑藏、汉文读物的综合性国家出版机构。嗣后，青海先后成立了青海教育出版社、青海中小学教材编写组、青海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教材编译处等专门的编辑出版机构。

一、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

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专门编辑印行佛教经典、戒律、仪规及天文、历算、历史、传记等方面的图书，是明、清时期青海

地区的主要图书编辑出版机构。据统计，青海全省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约有 20 余处，这些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的藏文图书，仅拉加寺、塔尔寺、夏琼寺、佑宁寺、隆务寺的印经院印行的藏文图书有上千种。

（一）结古寺印经院 位于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约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为玉树地区萨迦派的主要印经院，创建人系主持该寺的当钦哇·嘉昂喜饶坚赞。印经院设在寺院大经堂三楼，有房舍 24 间，主要编辑出版萨迦派的经籍和经院教学用书。此外，寺内扎仓（专门学院）尚设有小型印经院 3 处，计房舍 8 间。

（二）佑宁寺印经院 位于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乡郭隆沟，初建于清顺治年间，创建人松巴·隆多阿达丹曲嘉措。乾隆年间（1736—1795）该寺高僧土观·罗桑却吉尼玛、松巴·益希班觉、章嘉·饶贝多杰等待主持扩建印经院，分设土观府印经房、松巴府印经房等，主要编辑出版各该府高僧全集。乾隆三十一年（1766）松巴·益希班觉重新扩建该寺及其印经院藏经殿，耗银 5 万余两。

（三）夏琼寺印经院 位于今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乡夏琼山顶，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创建人为该寺第二十四任法台耶喜嘉措。由于该寺为宗喀巴早年学经之所，故誉为“格鲁派发祥地”，历代多有高僧静修著述。该印经院曾编辑印行多种佛教典籍，1958 年后印经院关闭，1980 年后逐渐恢复刊印工作。

（四）隆务寺印经院 位于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隆务庄，建于清乾隆初年，创建人为第二世夏日仓·阿旺程勒

嘉措。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经院重新扩建。该印经院曾编辑印行寺内高僧全集及医药、历史、道歌等著述。

（五）拉加寺印经院 位于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乡阿尼琼功山麓，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创建人为香萨·罗桑达杰。嘉庆十九年（1814）香萨·罗桑达杰集资重新扩建印经院，设立编辑、校对、缮写、雕板等部门，制订刊刻印行规章制度，由俄仁巴·罗桑顿珠、噶居巴·贤巴班觉等高僧 20 余人负责校勘工作，有工匠近 200 人，以刊刻印行《甘珠尔》大藏经等大型藏文经典闻名藏区。印经院为藏汉结合的四合院，占地 5.3 亩，北面为三层楼阁，东西南三面均为两层楼房，设有藏经殿以及校对、缮写、刻版、印刷、木板加工、储料、茶房等工房约 300 间。1959 年初毁于火灾。

（六）塔尔寺印经院 位于湟中县鲁沙尔镇莲花山，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创建人为第五世色多·益喜图丹嘉措，主要辅助者为当彩·罗桑克珠尼玛、本布尔、阿旺却吉尼玛等。印经院为一座互相衔接的一进三院藏汉式建筑，有房舍 40 余间，分设校对、刻版、印刷、裁装、藏版、储纸等部门，其中藏版库有房屋 8 间，存放各种经籍印版 3 万余块。新中国成立以前，印经院由寺院大经堂会议及下设的大吉哇（行政事务的办事机构）管理，大吉哇专设行政管家，主持印经院工作。管家中分设大小管家各一人，负责校对、刻版和印刷、发行等工作，每届任期两年。编辑校刊工作多由寺内高僧在自己的居住处作业。该印经院曾刊刻印行《宗喀巴全集》和青海地区高僧著述及其他经典名著。

印经院于 1958 年停业，1980 年始行复业。为集体所有制，

1985 年有固定资产 98 万元，编辑、校对、刻版、印刷等工作人员 70 余名，实行计件工资制。

(七) 支扎上寺印经院 位于化隆回族自治县支扎乡街道村，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创建人夏玛尔·根敦·丹增嘉措。印经院以编辑印行支扎上寺高僧学者的文集和诗歌、语言、藏文文法等书籍为主，以版式新颖、字体美观享誉藏区。1958 年后停业，1982 年始恢复编刻印刷业务。

(八) 土哇寺印经院 坐落在化隆回族自治县金源乡土哇村，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创建人为晋美·丹却嘉措和才旦夏茸·晋美柔贝罗哲。印经院主要编辑印行该寺高僧的著述。它所印行的《精水轮论》和《无畏者正理之狂笑》等书在藏区曾轰动一时。1955 年，才旦夏茸·晋美柔贝罗哲对印经院进行扩建，使之成为汉藏结合式四合院建筑，有瓦房数十间。1958 年，印经院随寺院拆毁，1982 年重建。

青海其他一些主要藏传佛教寺院印经院简况表

表 1

印经院名称	建立时间	创建人	规模及其沿革	坐落位置
杂藏寺印经院	元代（1268 年后）	噶·阿米丹巴	盛于明代，后遭战乱毁坏，20 世纪 50 年代逐渐恢复，1956 年后拆毁	称多县称文乡当隆庄
相古寺印经院	明代（14 世纪中叶）	嘉敦·南夸多吉	盛于明代，1968 年后拆毁	玉树县巴塘乡相古村